学术专论

清初苏州八旗驻防探析

王　刚

［摘要］顺治十八年，清廷为应对郑成功等反清势力的威胁，派祖永烈率汉军八旗进驻苏州，以加强江南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苏州八旗驻防官兵人数约为数千人，驻营于苏州城北部。祖永烈所部军纪败坏，八旗军圈地占房，强行驱赶居民等行为，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与破坏。苏州八旗军的军费开支也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康熙三年，由于反清武装对江南的威胁减轻，清廷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并将苏州八旗驻防裁撤。

［关键词］清初　八旗驻防　苏州　汉军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2－0101－06

A Study on the Banner Garrison in Suzho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e 18th year of the Shunzhi-reign period (1661), in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Zheng Chenggong and other anti-Qing forces, the Qing government ordered Zu Yonglie to lead the Hanjun Banners stationed in Suzhou, to strengthen the Jiangnan region's military defense forces.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Eight Banners Army in Suzhou and their barracks were in the north of the city. Zu Yonglie's troops were undisciplined and they occupied lands and homes, forced evictions of residents, and a destructive impact on the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military spending on the Eight Banners Army in Suzhou had also become a heavy financial burden. In the 3rd year of the Kangxi-reign period (1664), because the anti-Qing forces' threat to Jiangnan had been reduced, the Qing government re-adjusted its military deployment and abolished the Banner garrison in Suzhou.

清朝入关后，陆续在内地一些重要地点设立八旗驻防，以维系满洲贵族的军事统治。江南地区作为财赋重地，是清廷着重控制的区域。在江南，除了江宁、京口（镇江）、杭州等几个在清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驻防城外，清初的苏州也一度成为八旗驻防地点。由于苏州八旗驻防存在的时间短暂，因而在前人有关清代八旗驻防的研究中鲜有涉及。[①]本文将在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苏州八旗驻防设立、裁撤的背景与经过，并对苏州驻防的人员构成、组织编制、驻营区域及八旗军对当地民众的侵扰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苏州八旗驻防设立的军事背景

从顺治到康熙平定三藩之前，被学者称为八旗驻防制度的“草创时期”。[②]在这一时期，为应付持续不断的战事，清廷对八旗军调动十分频繁。八旗军在各地的驻扎也大多属于临时性质，往往伴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调整与变动。

八旗军曾于顺治二年（1645）时短暂驻扎苏州。当年五月，多铎率清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随后，清军又分兵掠取江南

［收稿日期］2012－12－10
［作者简介］王刚（1986—），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

各地，并于六月初进入苏州城。此后，清廷令梅勒章京李率泰、江宁巡抚土国宝二人共同率八旗军驻守苏州。

李率泰为汉军正蓝旗人，时任刑部参政，《钦定八旗通志》称他在顺治二年“分领精兵三百狥苏州、松江”。[③]可见，由李率泰统领的这支苏州八旗军只是一支小部队。八旗军此次驻防苏州，只持续了短短数月时间。同年七月二十六日，苏松提督吴胜兆由江宁来到苏州上任。[④]八月初一日，李率泰即领军离开了苏州。[⑤]吴胜兆所部属于绿营系统，由此，清朝当局用绿营军替代八旗军，承担起苏州的防务。总的来看，顺治二年间八旗军在苏州的驻扎，只是清廷在军事上的权宜之计。这时的苏州八旗军人数很少，并无完善的体制，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八旗驻防。

顺治十八年（1661），八旗军第二次进驻苏州。当年十月，清廷任命祖永烈为宁海将军，率八旗军前往苏州驻防。[⑥]苏州八旗驻防遂正式建立起来。此次八旗军部署的调整，与当时江南地区的军事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南明抗清势力此前曾从海上对江南展开过多次大规模的攻势。顺治十一年（1654），南明定西侯张名振与监军张煌言等人，以崇明岛为基地，先后三次率水军攻入长江，最远曾到达镇江附近的瓜州、金山等地，一度逼近重镇江宁。而在顺治十六年（1659）六、七月间，郑成功更是亲率水陆大军直入长江，大败清军，攻占镇江等地，进而屯兵江宁城下。虽然郑成功最终兵败退走，但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却也一度岌岌可危。在此形势下，加强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等重要城市的防务，是清廷面临的当务之急。

其次，顺治后期，驻守苏州的清军力量较为薄弱。在李率泰指挥的八旗军撤走后，苏州一带的防卫由苏州总兵统辖的绿营军承担。到顺治十四年（1657），鉴于崇明岛孤悬海外，受到南明方面很大的军事威胁，清廷任命时任苏州总兵的梁化凤为水师总兵，率所部移驻崇明，同时将苏州总兵一职裁撤。[⑦]如此一来，苏州地区的防务就变得十分空虚。在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军队攻入长江时，苏州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只是由于郑成功以江宁为进军的主要目标，并没有分兵攻取江南各地，苏州才侥幸未曾易手。郑成功退走后，为防备抗清武装的再次来袭，清军自然要进行军事上的重新部署，以增强苏州的防御力量。

此外，清廷之所以派出八旗军而非绿营军驻扎苏州等地，则是出于对绿营军的不信任。顺治年间的绿营军大多是由汉人降军改编而成，许多将领对清廷仍存有贰心，他们惯于见风使舵，并不肯真正卖命。在顺治十六年的江南战事中，一些绿营将领的表现即证明了这一点。当郑成功率军经由吴淞口进入长江时，驻守当地苏松提督马逢知因曾与郑成功秘密联络，并有“反正之意”，[⑧]遂未派兵阻击，使得郑军船队轻易驶至镇江、瓜州等地。清朝统治者也深知，像马逢知这样的绿营将领根本不足以信任。因此，清廷才特意派出八旗军千里迢迢奔赴江南驻守。顺治十六年八月，就在郑成功兵败退走后不久，清朝当局即任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率八旗军驻防京口。[⑨]而顺治十八年派祖永烈驻防苏州，也是清廷增派八旗军，以加强江南军事力量的重要举措。

二、苏州八旗驻防的旗分与人数

有关苏州八旗驻防的设立，官修《清实录》中只有一段简短的文字：“（顺治十八年十月）升江南江宁总兵官祖永烈为苏州宁海将军，驻扎苏州。”[⑩]而有关苏州八旗驻防的旗分、人数、驻营区域、军费开支等具体情况，在《清实录》中几乎没有记载，尚需借助对其他史料的梳理，来弄清上述这些问题。

苏州驻防将军祖永烈，辽东人，其父祖可法是明末著名将领祖大寿的养子。[⑪]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祖可法在关外大凌河降清后，于崇德七年（1642）被编入汉军八旗，隶属于正黄旗汉军第二参领（甲喇）第四佐领（牛录）。祖永烈在出任苏州将军前，也曾管理过该佐领。[⑫]祖永烈既然是汉军旗人，以他为统帅的苏州八旗军也应当是由汉军八旗所组成。这一点，可以参考与苏州驻防几乎同时设立的京口驻防的情况。在《京口八旗志》一书中明确记载，京口驻防由汉军固山额真刘

之源统辖，全部由汉军八旗组成。[13]

此外，从各种史料中留下的若干苏州驻防将领的记载上看，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部出自汉军旗。如有汉军正红旗都统郎赛[14]、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傅大受[15]、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刘邦柱[16]、汉军镶黄旗协领石调声[17]、汉军镶蓝旗人郑育民[18]、汉军镶蓝旗人夏世福[19]等。另外，还有协领朱万化[20]等人，在史料中虽没有记载其所属的旗分，但从姓名上看，他们无疑也隶属汉军旗。同时，在各种文献中并没有满洲八旗或蒙古八旗人员驻防苏州的记载。因此可以判断，苏州八旗军全部由汉军组成。

顺治末年，江南地区形成了江宁、京口、苏州三个重要的八旗驻防据点。自顺治二年清军南下后，江宁城就一直屯驻着八旗军。据记载，顺治十八年时，江宁八旗驻防的总兵力为3000人，全部由满洲、蒙古八旗组成，并无汉军。[21]从清军的兵力部署上看，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江宁由清廷最为信赖的满蒙八旗军驻守。江宁外围的京口、苏州两城驻扎着汉军八旗，形成拱卫之势。而濒临大海，处在与反清武装作战前线的崇明、吴淞等地，则由绿营军守卫。不难看出，在这种以江宁为中心的防御体系里，从内到外屯驻的各支军队，对清廷的忠诚度逐渐递减。如此内外有别、分层设防的格局，充分体现出了清廷奉行的满洲本位主义，即以满蒙八旗控制核心要害区域，而将汉军八旗和绿营置于次要地点和战事第一线，充当马前卒。

据时任江宁巡抚韩世琦的《抚吴疏草》一书记载，苏州驻防八旗“官兵、笔帖式、孤处、弓匠、铁匠、家口，共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三员名口”。[22]这个数字很庞大，不过，真正能够作战的军人很可能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因史料的缺乏，苏州八旗驻军的准确人数和具体编制等细节，现已无从考证。然而，不妨以京口八旗驻防的相关资料，来推测苏州驻军的情况。据记载，当时的京口八旗军共有“镇海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协领八员，参领八员，防御四十员，骁骑校四十员，额设兵三千名”。[23]如前文所述，同处江南的京口与苏州两地八旗驻防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几乎同时设立，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又都是由汉军旗人组成。因此，苏州驻防在人数、编制上与京口驻防当相差不大。据此，苏州八旗军作战人员的数量当在数千左右。

三、苏州八旗军的驻营区域、军费开支及对民间的侵扰

八旗军在苏州驻防的时间虽较为短暂，但官兵、家口等数万人组成的庞大队伍的骤然进驻，仍然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与破坏。事实上，祖永烈所部军纪之败坏、口碑之恶劣，在当时各支清军部队中十分突出。这在各种史料中不难找到相关记载。如《明季北略》称：祖永烈“镇苏州，其军甚恣，苏人大被其毒”。[24]同治《苏州府志》也载：“北来军士素骄横，为民患。”[25]此外，指责苏州八旗军令“地方骚动”[26]之类的记载更是不乏其例。然而，由于八旗军享有政治、法律上的特权，又倚仗自身武力，地方政府对其毫无约束力。

对苏州当地百姓而言，首先遭受的侵害是被强迫迁徙。清廷自入关后，为确保八旗组织在人数众多的汉人社会中的独立性，并维持其剽悍的战斗力，开始在各地实行旗、汉民分居政策。北京内城的数十万汉人就曾被强行赶往外城，将内城腾给来自关外的八旗军居住。[27]顺治二年清军进入南京后，即将城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地，强行驱逐这里的居民，“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西为民舍”。[28]顺治十六年设立的京口驻防，也是在“城内圈西南隅文昌、儒林、黄佑、怀德等坊居民房屋，分派八旗驻屯”。[29]而在顺治十八年，祖永烈所部抵达苏州后，同样展开了大规模的圈地占房行动。八旗军起初计划圈占位于苏州城中心位置的王府基为驻地。[30]王府基是元末张士诚的吴王宫殿旧址，明代被划为禁地，逐渐荒废。但因王府基地处苏州城中心，周边是人口稠密的繁华地区，若八旗军在此地扎营，周边众多民居势必也都会被圈占，若此将给当地造成巨大破坏。为此，分守苏松常道方国栋等地方官员据理力争，最后使八旗军放弃了王府基，另选地点安营。

至于八旗军在苏州最终选定何处作为驻地，在各种文献中说法不一。据《碑传集》

称，祖永烈等人在进驻王府基的企图未得逞后，“改营城南隟地”[31]。但乾隆时苏州人顾公燮的《丹午笔记》一书则记载八旗军驻扎于苏州城北部，还详细指明了八旗军营区的具体方位：“自娄门直至桃花坞宝城桥止，独不及后厂一隅。”[32]顾公燮为苏州当地人士，理应熟悉苏州的乡土人情与历史典故，他的说法自然更为准确。此外，同治《苏州府志》也称，拙政园在清初曾被抄没入官，八旗军进驻后将其作为驻防将军府。[33]而拙政园位于苏州城东北部，正在顾公燮所描述的八旗军驻地范围内。两种史料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可见，有关八旗军扎营苏州城北的记载才是准确的。

八旗军在苏州城北的驻营区域内圈地占房，是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清军将领一声令下后，陆续“圈去民房大半”，[34]百姓们“星夜移徙，安土重迁，势难远去。各就附近庐舍，稍可栖身，便为宁宇。抛产弃土失业者，什居其半”。这种圈占除造成百姓的失业和流散外，还导致“供赋逋欠，贻累里甲”，政府的赋税收入由此减少。[35]因而，地方官民上下都是怨声载道。

然而，八旗驻军欲壑难填，他们一再巧借名目，试图继续扩大已圈占的地盘。康熙二年（1663），清廷命令苏州驻防八旗增设 16 名章京。将军祖永烈等人趁机提出，安置每名章京及其家口等要建房屋 25 间，总计房屋 400 间，需要在城中扩大圈地范围。苏州原本就地狭人稠，经过顺治十八年八旗军大规模圈地后，城中人地矛盾更为突出，剩下的都是“商民辐辏、肄业营生之所”。[36]这些地方一旦被圈占，对地方社会经济的破坏更大。另一方面，在八旗军已经占据的地盘里，实际上“空地甚多”，[37]足以建造新房屋，根本不需要再行圈占。在此情况下，江宁巡抚韩世琦、布政使佟彭年、苏州知府吴道煌等地方官员一方面上书反对八旗军扩大圈地，一方面组织官员、士民捐献银两。韩世琦等人带头出资，最终筹集白银 1 万 1 千余两，用于在八旗军旧有圈地中的空地上为章京们新建房屋，又在附近购买了少量房屋。最终“建置房屋共四百零二间”，才使得“旗员驻扎得所，百姓安业如常”。[38]地方官员、百姓们的这种自我牺牲，暂时化解了八旗军企图扩大圈地而引发的危机。

苏州八旗军每年的军费开销，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而这些费用，不仅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也成了江南地区百姓的沉重经济负担。八旗兵将们携家带口而来，总数达三万多的各色人等，都需要由清政府发给粮饷养活。据韩世琦向清廷奏报，从顺治十八年九月到十二月，在祖永烈所部初到苏州的 4 个月里，他们就消耗了饷银 17144 两、白粟米 22393 石、豆 33491 石、草 86 万余束。[39]而在康熙元年（1662），清当局又一次性向苏州八旗军拨银 50 万两，以充作当年的军费。这笔 50 万两的军费来自江南右布政使所辖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的“正赋金花等银”以及“滴珠银”、“颜料改折并铺垫银”、“协济驿站改解部银”、“上元等八县食盐课银”等各项收入。[40]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康熙元年时，江南右布政司辖境全年的正赋金花等银总收入为 96 万 1 千余两。[41]苏州八旗军一年所需费用相当于江南五府金花银总数的一半还多。不难看出，苏州驻防八旗的军费开支，对于江南地方政府和百姓，是一个异常沉重的包袱。

四、苏州八旗驻防的裁撤

清廷设立苏州驻防八旗的初衷，在于防备郑成功等反清势力进袭江南。而康熙元年郑成功逝世后，郑氏政权爆发内讧，力量有所削弱。郑成功之子郑经据守台湾岛，暂时无力再对大陆沿海发动大的攻势。当时，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清朝统一全国指日可待。在此情形下，清军面临的压力大为减轻，各地的布防措施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苏州八旗军原本就因骚扰百姓、虚耗粮饷等问题为人诟病，此时更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众多官员向清廷建言，力主裁撤苏州驻防。

在这些清朝官员中，云南道御史陆祚蕃的意见颇具有代表性。他在《请酌驻防缓急疏》中提出了裁撤苏州八旗驻防的两大理由。首先从军事上看，苏州原本就不需要屯聚重兵，况且在江南各要地，“崇明有提督矣，松江有提督矣……京口有将军矣，江宁有重兵矣”，已足以担负起军事防务。其次从财政上看，苏州

等地原本“地方有经制之兵，标下有额设之卒”，现在又加上驻防八旗军，形成冗兵之害，“养兵不用，徒令逍遥河上，不战不耕”，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其糜费为何如哉！”[42]当时还有监察御史蒋伊，也指责苏州八旗军“糜饷扰民”，要求将其“移驻它要地”。[43]在苏州当地，江宁巡抚韩世琦对八旗驻防之害有切身体会，他也“奏言江南宁谧，力请调回”。[44]

当时的江南可谓是重兵云集，江宁、镇江、苏州、杭州四城有八旗军屯驻，崇明、松江等地则驻有绿营军。此外，在顺治十六年江宁之役时，清军曾从江西、陕西各派出 3000 绿营军前来江南增援，这些援军后来也一直驻守在江南。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后，自然就不需要再维持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康熙三年（1664）闰六月，在全国各地局势逐渐平静的背景下，清廷下令“撤回驻防苏州汉军章京兵丁”。[45]由于驻防苏州的均为汉军，因而，这道命令实际上即是宣布将苏州驻防完全裁撤。

不到 3 年的苏州八旗驻防就这样宣告终结。值得一提的是，裁撤苏州驻防是当时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裁军、撤军行动的一部分。除撤走苏州八旗军外，从江西、陕西前来江南的绿营军也都被命令撤回各省原驻地。与此同时，清廷还分别裁撤了浙江、山西、直隶、陕西等地的若干驻军。[46]

在江南地区，清廷将苏州驻防裁撤，而同样设立于江宁之役后的京口驻防却被保留下来，这主要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清军当时把来自海上的侵袭视作对江南地区的首要威胁，若要对此进行防范，位于江南腹地的苏州并非驻兵的首选之地。镇江在经济上虽不及苏州发达，但它扼守长江与大运河交汇要冲，是江宁的门户，“东南锁钥，实在于兹”，[47]战略价值更高。因此，苏州与镇江两处驻防的一撤一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外，苏州八旗军一直声名狼藉，遭到了中央到地方众多官员的指责，这也是导致苏州驻防被单独裁撤的原因。

苏州八旗军的撤离，仍然在江南产生了不小的骚动。清廷撤军令下后，祖永烈率所部兵丁、家口等三万七千余人，需经由大运河，从水路返回北京。由于“江南原无额设载兵船只”，[48]因而八旗军所需的大量船只、民工，全部要由地方政府提供，最后在征集大小船只 1584 只后，才将这支八旗军送走。[49]祖永烈所部虽离开苏州，但沿途所经之地，仍然不时骚扰百姓。据地方志记载，八旗军途经无锡，当地百姓一时“汹汹”，无锡知县吴兴祚“请都统令箭，单骑往来弹压”，才维持住秩序。[50]苏州八旗军纪律之败坏，再一次得到了史料的印证。

三藩之乱爆发后，八旗军曾第三次进驻苏州。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十四年正月）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疏言：江南财赋重地，界接诸省，宜增守兵……署副都统额思赫，率满洲、蒙古兵守苏州。”[51]由于史料的缺乏，此次进驻苏州的八旗军人数等详情均已无考。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八旗军驻守苏州，只是战争期间临时性的军事调动，完全不同于常态化的八旗驻防体制。

清初，八旗军曾先后三次进驻苏州。但唯有顺治十八年的第二次进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八旗驻防。清廷从顺治十六年的江宁之役中得到警示，为加强江南地区的防御而设立了苏州八旗驻防。随着郑氏政权势力衰落，清朝所面临的威胁大为减轻，随即在江南等地削减军队数量，苏州驻防裁撤便是该举措之结果。苏州驻防虽然只存在短短 3 年，但八旗军给当地社会造成的巨大侵害不容忽视，成为体现清初军民矛盾、旗民矛盾的典型事例。

---

①有关清代八旗驻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韩］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三联书店，1993 年）、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等。

②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29 页。

③《钦定八旗通志》卷二百六《大臣传·李率泰》，李洵等点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3670 页。

④佚名：《吴城日记》卷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16 页。

⑤佚名：《吴城日记》卷中，第 218 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五，顺治十八年十月丁巳，中华

书局，1985 年，第 92 页。
⑦《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二，顺治十四年十月庚寅，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80 页。
⑧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陈碧笙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91 页。
⑨《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顺治十六年八月癸巳，第 987 页。
⑩《清圣祖实录》卷五，顺治十八年十月丁巳，第 92 页。
⑪《清史列传》卷七十八《贰臣传甲·祖可法》，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 年，第 6438 页。
⑫鄂尔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卷十三《旗分志十三·正黄旗汉军佐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44 页。
⑬春元：《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建志》，马协弟点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79 页。
⑭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二《职官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298 页；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七十九《名臣列传三十九·正红旗汉军世职大臣二》，第 4300 页。
⑮《清圣祖实录》卷十三，康熙三年十二月辛未，第 204 页；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二百十八《勋臣传十·镶黄旗汉军世职官》，第 4989 页。
⑯《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康熙三年二月戊午，第 173 页；《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六年十二月丙戌，《清实录》第 4 册，第 342 页。
⑰佚名：《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石调声列传》，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年，第 767 页。
⑱⑲鄂尔泰等纂：《八旗通志》（初集）卷十六《旗分志十六·镶蓝旗汉军佐领》，第 288 页；第 290 页。
⑳《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康熙三年闰六月壬午，第 190 页。
㉑《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七十四《八旗都统·兵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500 页。
㉒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四十七《防苏官兵回京日期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8 辑，第 8 册，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275 页。
㉓㉙春元：《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建志》，第 479 页。
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洪承畴降清”条，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32 页。
㉕同治《苏州府志》卷六十八《名宦一·国朝》，《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8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779 页。
㉖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二·吴道煌》，《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1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第 514 页。
㉗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8 页。
㉘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十九日庚子”条，第 220 页。
㉚㉛邵长蘅：《中宪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苏松常道方公墓志铭》，载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七十九《康熙朝监司上》，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254 页。
㉜顾公燮：《丹午笔记》“祖大寿”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61 页。
㉝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六《第宅园林二》，第 8 册，第 367 页。
㉞㉟㊱㊲㊳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四十四《报建造章京房屋疏》，第 8 册，第 151 页；第 150 页；第 149 页；第 150 页；第 152 页。
㊴韩世琦：《抚吴疏草》卷二十一《覆防苏官兵支过豆草价值难以核减疏》，第 6 册，第 551 页。
㊵韩世琦：《抚吴疏草》卷二十五《报康熙二年防苏兵饷疏》，第 6 册，第 689 页。
㊶韩世琦：《抚吴疏草》卷二十九《报粤饷项下正赋已完其缺额见在凑补疏》，第 7 册，第 121 页。
㊷光绪《平湖县志》卷十六《人物·国朝》，《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20 册，上海书店，1993 年，第 380 页。
㊸彭绍升：《故提督河南学政按察使副使蒋公伊事状》，载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五十三《科道上之中》，第 1521 页。
㊹同治《苏州府志》卷六十八《名宦一·国朝》，第 8 册，第 779 页。
㊺㊻《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康熙三年闰六月己卯，第 189 页；第 189—190 页。
㊼春元：《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建志》，第 479 页。
㊽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四十九《祖将军回京雇船价银数疏》，第 8 册，第 363 页。
㊾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四十九《祖将军回京雇船价银数疏》，第 8 册，第 364 页。
㊿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十八《名宦·国朝》，《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24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92 页。
51《清圣祖实录》卷五二，康熙十四年正月壬午，第 681 页。